

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

王江松
著

綫裝書局

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



綫

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 / 王江松著. —北京：线装书局，2012. 4

ISBN 978-7-5120-0541-9

I. ①知… II. ①王… III. ①知识分子—研究—中国
IV. ①D663.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5697 号

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

著 者:王江松

责任编辑:杜 语 孙嘉镇

排版设计:秋 水

出版发行:线装书局

地 址:北京鼓楼西大街 41 号(100009)

电 话:010 - 64045283 64041012

网 址:www.xzhbc.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18.5

字 数:333 千字

版 次:2012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2000 册

定 价:58.00 元

作者简介

王江松 中国社会科学
院哲学博士，中国劳动关
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副院
长、教授，劳动哲学与劳
动文化研究所所长。出版
专著9种，发表论文60余篇。
长期从事个性哲学、悲剧
哲学、劳动哲学的研究，
在社会哲学、文化哲学方
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目前正致力于中国劳资关
系、社会转型、宽政民主、
知识分子等问题的研究。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知识分子的清高心态和忧患意识	1
清高的词义演变	/ 1
一个清高者的自我画像	/ 3
解剖清高	/ 4
告别清高	/ 8
清高与忧患	/ 11
个人权利与社会发展	/ 13
群体人格与个体人格	/ 16
忧患意识与自由精神	/ 19
民族救亡、社会革命与个人自由	/ 27
第二章 知识分子的道德狂热和良知幻觉	36
个体本位道德与群体本位道德	/ 36
道德判断与价值判断	/ 39
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	/ 41
道德妄想、道德洁癖和道德热病	/ 43
现代化与道德宽容	/ 47
个人良心和社会良心	/ 53
为己的良心和为他的良心	/ 54
传统型社会良心与现代型社会良心	/ 56

依附的社会阶层与独立的社会阶层	/ 59
自我实现与自我超越	/ 63
第三章 知识分子的经济定位	65
传统社会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	/ 65
资本主义和工业市场经济:知识分子的第一次历史性机遇	/ 67
现代资本主义和知识市场经济:知识分子的第二次历史性机遇	/ 74
知识产权与知识资本	/ 78
知识资本家:传统知识分子和传统资本家的历史合题	/ 88
中国知识分子的经济定位问题	/ 92
第四章 知识分子的政治定位	120
知识分子在 20 世纪中国政治现代化过程的悲剧命运	/ 128
21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定位	/ 148
第五章 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定位	157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	/ 157
中国传统文化的痛苦蜕变	/ 165
文化转型的战略之一:中西互为体用论	/ 182
文化转型战略之二:经济政治独立之上的思想文化独立	/ 195
21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立场	/ 206
第六章 知识分子的历史定位	252
脑力劳动者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 252
精英意识与平民情结	/ 265
知识崇拜与反智主义的终结	/ 280
重点参考文献	289

第一章

知识分子的清高心态和忧患意识

清高的词义演变

清高，最初肯定是一个褒义词。“清”：清新、清白、脱俗，出污泥而不染；“高”：高洁、崇高、高远，飘然出尘。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爱以清高自许，更希望博得清高的美名。在历代知识分子都推崇的“魏晋人格”、“魏晋风度”中，清高是其主要特色。

与“清”反义者为“浊”，与“高”反义者为“下”，因此，“浊下”、“低俗”、“下贱”、“恶浊”、“恶俗”，等等，就成为清高的反义词，成为清高的知识分子蔑视和贬斥的一种人格和生存状态。

与此同时，“清高”还有一个反义词，叫做“假清高”，即表面上附庸风雅、标榜清高，而骨子里庸俗、势利、热衷于追求权力和财富。魏晋人物中有很多这种人。更有一种高明的人，特别有耐性，特别善于等待，他长期退隐林泉、坚辞不仕，正是为了抬高自己的名士身价，好让帝王家出更高的价钱。这叫做“待价而沽”。

但是，随着时代的推移，清高的词义也在发生一些悄悄的、耐人寻味的变化。比如一个妻子可能会抱怨她的丈夫说：“是啊，我知道你清高，但是家里正等米下锅呢。”一个兄长可能会指责他的弟弟说：“你太清高啦！人家一片好心想帮你，你竟然一口拒绝，实在太不通人情。”更有一种激烈的批评：“清高？清高值几个钱？清高能当饭吃吗？”“清什么高啊？无非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罢了！”

这时候，会听话的就会听出这样的意思：“清高”似乎与“固执”、“迂腐”、

“寒酸”、“窝囊”、“无能”这些词挂上了钩。这还只是别人对清高者的评价。让我们再听听清高者的自我感觉：

“孩子他娘，你去想想办法吧，我实在低不下这颗头！”“世上乌鸦一般黑，可怜我满腹才学，报国无门呀！”“穷就穷，怎么能去与他们同流合污呢？”“人生自古谁无死？有权有势的人不可一世，到头来也难逃一个死。不如我们一碟花生一杯酒，一局残棋到天黑，也挺自在！”

大家有没有听出来，这些话里已经有一点点不负责任，有一点点怨愤，有一点点听天由命，有一点点阿 Q 精神。

清高成了一个含义复杂的词语，成了一个有褒有贬的词语。应该说，这是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里的尴尬地位的反映。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一部分通过科举制度或裙带关系，进入了仕途。既然在官场里混，再自命清高，自然是不合时宜的。所以，他们也就放弃了清高，或者只是故作清高而已。没有进入仕途的那部分知识分子，或者皓首穷经，应举至死；或者靠祖业吃饭，在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和故纸堆中消磨一生；或者教书糊口，或者入幕为僚，作个清客或书记员；或者干脆出家为道、为僧——“清高”便成为这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精神寄托和人格追求。然而，他们没有独立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他们不得不依靠这个社会生活，他们怎么能真正清高起来呢？

清高这个词的含义还在继续演变。在当代社会，至少在我的词典里，清高已完全演变为一个贬义词；清高可以表征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落后性、保守性和劣根性！这倒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保持清白、正直、善良、高尚的人格了，而是因为：

第一，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清高”中所含的贬义越来越突出了，清高型的人格已经从整体上不适应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了。

第二，保持和发展清白、高洁、正直、崇高的人格和操守，不必采用“清高”的形态或形式，而可以用更为豁达、更为积极、更为进取、更为强力、更为健康的形式或形式表现出来。

第三，因此，可以把“清高”中的正面的、褒义的方面取出来，用其他的词语来表达，只保留其负面的、贬义的方面。这样，“清高”就成了一个贬义词了。

很显然，这种语义学上的革命，更有利于表达一种新型的文化价值观念。

一个清高者的自我画像

我对知识分子清高人格的这种清算和批判,首先来自于一种自我清算和自我批判。

十年以前,我就是一个典型的清高型知识分子。表面看来,我是十分激进、十分叛逆、思想十分解放、观念十分现代的人;我至少也是一个“改革派”,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我正好进入大学,那时全国正在进行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1982~1983年,学术界开展了全国性的“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大讨论(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我几乎阅读了全部讨论文章,热烈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对青年马克思推崇不已,对现实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深恶痛绝;1984年,一场“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使学术界一时陷入沉寂,但是很快,以批判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引进现代西方文化为特点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以更加高涨的势头席卷而来,存在主义热、弗洛伊德热、弗洛姆热、马斯洛热、尼采热、劳伦斯热……一浪高过一浪。每一个环节我都经历了,每一次高潮我都置身于风口浪尖上。我不是改革派,谁是改革派?我不是民主派,谁是民主派?我不是现代派,谁是现代派?

但是,革命只发生在表层意识结构,还没有渗透到深层心理结构;甚至于在意识层面,也只是以一种新的偏激代替了老的偏见,以一种新的极端思维代替了老的极左思维,以一种新的英雄主义代替了老的偶像崇拜,以一种新的舍生取义代替了老的理想主义……在骨子里,我还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知识分子。

我是一个清高的、自我神化的人。

我家里很穷,很苦。大学毕业时,我父母、亲戚都希望我分回老家,在地区或县里谋个一官半职,象别人家能干的子女一样为家里带来好处(在老百姓的心目中,读书——做官——发财,是天经地义、人人羡慕的)。我忍心拒绝了他们的要求,打破了他们的希望,坚定地选择了他们所无法理解的学术之路。这么多年来,我宁可省吃俭用,以至于刻薄地、苛酷地对待自己,把工资的大部分寄给了母亲;我宁愿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家庭依然在农村社会的底层挣扎,宁愿每次回家时目睹和忍受贫困带给家庭的屈辱和带给我的锥心的痛苦,也从来没有动摇自己的决心,从来没有想过怎样去改变自己和家庭的经济状况。

我甚至断然拒绝了别人的约稿,虽然稿酬不菲,虽然写那些东西对我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但我认为,写这种我不想写的东西,写这种“假大空”的东西,

有辱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有失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格。

我把一切利用自己的知识或知识分子身份去谋取功名利禄的行为，称之为“谋生行为”，甚至可能是一种参与瓜分剩余价值的谋生行为，是一种谋取不义之财的可耻行为。

诸如：为报纸、杂志写一些人云亦云、没有创见的文章；引经据典、七拼八揍地写出一些教科书（某些学科内容雷同的教科书在全国有上百种之多）或所谓学术著作；循规蹈矩、照本宣科地在课堂上从事“口力劳动”……然后又以上述“科研”和“教学”成果去争取职称，然后又顶着高级职称和专家学者的荣冠发表更多的文章、著作，到处讲学，做主编、顾问……

我宁愿去写那些能够流传青史，但一生都得不到发表的文章，也决不去写那些马上能得到发表并给自己带来好处，但很快就会被人遗忘甚至于从来就没有人看的文章。

如果注定要我承受终身的孤独、终身的寂寞、终身的穷困、终身籍籍无名默默无闻的命运，那就让我去承受吧！

我心中荡漾着一种孤独者的伟大、殉道者的悲凉与叛逆者的豪迈和壮烈！

可以把我认定为清高者中最极端、最决绝、最孤愤、最崇高的那种。这种人可能发展成为不世出的宗教领袖或乌托邦主义思想家，愤世嫉俗、孤标绝响的艺术家，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革命者。他们是清高者中天赋最高、能力最强、生命力最充沛的那种。

但是，他们也始终是一种清高型的知识分子，始终带有清高者特有的情感特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始终带有严重的历史局限性，并最终成为历史的落伍者、被抛弃者，成为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发出的最后的流光溢彩。

解剖清高

让我们以锋利的解剖刀无情地打开清高者的隐秘的心灵结构。

一、清高者的基本价值判断

清高者的基本价值判断是清高型人格的内核，它决定了清高者的思维方式、性格和心理状态。

这一基本的价值判断就是：德行高于事功、仁义高于权利、人格完善和精神

高洁高于政治权力和物质财富。而且,两者不仅仅有高低之分,在大多数情况下,两者还是对立的,也就是说,争权夺利、建功立业、追求世俗的成功,往往都是不择手段的、邪恶的、残忍的,是不道德的,即不仁不义的。

之所以产生这种基本的价值判断,原因如下:

1. 在等级制和专制制度下,政治权力和物质财富的追逐确实是(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不道德的过程。知识分子卷入这一过程,或者很快被同化并取得某种优势地位,或者因为不适应而愤然或颓然退出。

2. 知识分子是依附于、附丽于特权阶级的,他们本身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权力,他们最多只能通过加入那个阶级,做一个清官,为老百姓办一些好事、实事,来弥补制度的弊端,而不能从根本上改造这个制度。

3. 知识分子是一个拥有“文化资源”或“精神财富”的特殊阶层,虽然在经济、政治上是依附性的,但具有文化上、精神上的相对独立性。由于知识分子不能把自己的“王道”、“仁政”理想付诸现实,不可能按自己的道德原则去改造现实的经济政治结构,于是他们致力于文化本身、精神领域本身的发展,并在这种相对独立的发展中找到自己的自尊和安身立命之所。

由于以上三个理由,知识分子自然会得出上述那个基本价值判断。

这个基本价值判断的突出特点就是:道德判断高于利害判断、高于是非判断、高于事实判断、高于能力判断、高于功过判断、高于美丑判断;道德与否成为评价人与事物的最高标准,甚至于是最唯一的标准。

比如,当一个知识分子与他人发生利害冲突和争执时,只要第三者(仲裁者、劝解者或旁观者)在道德上对他给予褒评,哪怕是故意给他戴高帽子而已,这个知识分子的火气就会消掉一大半,并且很快就会“大人不记小人过”了。

又比如,一个做官的虽然没有什么行政才能,也没有什么政绩,但如果他为官清廉,必定会得到知识分子的高度评价;反过来说,一个做官的,虽然有能力、有政绩,但人品不好,德行有亏,他必然受到知识分子的否定性评价。

二、清高者的思维特征

清高者的思维方式有两个基本特征:

1. 武断、峻急、偏执、非此即彼

因为自我神化,因为以德行操守自傲,因为以道德判断取舍人与事,因为对有权有财者愤愤不平而又无可奈何,于是,便干脆对他们加以全盘否定。在他们看来,当官的人,无一幸免都会堕落和腐败,所谓无官不贪,无官不恶;做生意

的人，无一例外都会唯利是图，谋取不义之财，所谓无商不奸，无商不诈。

知识分子与这个世界是不能通融的：这个世界不愿意理睬知识分子的批判，知识分子自己也没有能力去改造这个世界。

知识分子只能与这个世界保持这种紧张的、格格不入的、疏远的或对立的状态，同时又不得不经常承受来自这个世界的侮辱、伤害和打击；知识分子远远不是这个世界的对手。

知识分子中最激烈、大胆的一种，主张用暴力摧毁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的废墟上，建立一个绝对道德、公正、平等、自由的大同世界，一个没有差别、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乌托邦和理想国。

知识分子中比较温和的一种，希望这个世界由于本身的罪恶而遭受某种毁灭性的灾难，遭受天谴，使人类能够幡然醒悟，从而退回到远古的自然状态，恢复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统一。

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世界本身是无药可医的，是不可能完成自我否定而进入到高一级发展状态的。

2. 空泛、高远、玄妙、不切实际或复古倒退，钻入故纸堆中，以整理、诠释古籍来消磨自己的精力和才能

因为无力也不愿积极、主动地介入社会、改造社会，于是，传统知识分子只好在自己狭小的精神圈子里自我膨胀，发展出种种抽象、精妙的玄学理论，形成一种坐而论道、放言高论、眼高手低、光说不练的恶劣习气。有的人虽然痛恨“清谈误国”，希望能够“经世致用”，但同样没有想到要发展出一整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去实际地发展经济、改造政治，而是皓首穷经，把毕生的精力用于古籍的考证，使训诂学、音韵学发展到畸形的、吹毛求疵的地步，同样走入了学术的死胡同。

总之，清高者的思维方式是封闭的而不是开放的，是固守传统的而不是不断创新的，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

三、清高者的性格和心理特征

由于传统知识分子处于一种尴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由于他们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与现实社会严重疏离，由于他们鄙视这个世界而又摆脱不了这个世界，并且不得不依附于这个世界，由于他们痛恨和否定这个世界，但实际上反过来经常被这个世界所否定和抛弃，他们便形成了一种自相矛盾的以至病态的性格和心理。

1. 坚强——脆弱

清高者一方面因为自己精神上的追求,而感到坚强,但同时也感到这种坚强的基础是脆弱的。他“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他必须时刻抗拒外界的压力和诱惑,他必须时刻克服内心的私欲和自然冲动,否则就很难保住自己的清白和高洁。有时候,他感到自己像马上就要被大风吹倒的芦苇一样脆弱,一样无力;有时候他感到很累,真想放弃自己的堤防,让大水把自己冲垮。事实上,许多清高的知识分子都妥协了、放弃了、与时间化了。

“清高”永远是防守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永远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这就注定了清高者的内心深处是脆弱的,尽管他看上去非常坚强和坚忍不拔。

2. 自傲——自卑

当清高者吟风弄月、赋诗作画,徜徉于自己的精神世界时,当他与朋友们一起粪土王侯、指点江山或谈天说地、评古论今时,他是自豪的,他是傲岸的,他藐视群小、睥睨俗世,虽一世不可我,我亦不可一世。但一当他进入现实生活,就会立刻陷入严重的自卑之中。他不能成为一个好丈夫、好父亲,无颜面对妻儿;他不能很好地完成自己的社会角色,无力承担自己的世俗责任。看着自己的父母、兄弟受人欺凌,看着自己的妻子、儿女跟着自己受苦,他的心在流血,他的自尊心受到无情的摧残——他在人前昂起自己高傲的头颅,在人背后不得不忍受家人的抱怨和指责。自傲和自卑、自豪和自我谴责在他内心里进行着激烈的交战。

3. 崇高——鄙俗

面对着无法或不愿进入的权力、财富和享受的世界,知识分子表现出一种自我牺牲、自我克制和自我约束。但是,当利益分配在本阶层范围内进行时,知识分子也是不能免俗的,也会展开争夺利益的斗争。传统知识分子,作为统治阶级(表现为国家政权)的一个附属阶层——肯定不是被统治阶级、劳动阶级的附属阶层,因为他们被剥夺光了,养不活这样一个阶层——处于社会的中间位置。国家一方面要保障这个阶层能够脱离艰苦的体力劳动,有比较体面的物质生活条件,以便他们能够从事文化的继承、传播和发展工作;另一方面,国家也会从这个阶层中不断挑选人才,以补充自己的官吏队伍。只有当知识分子不听话甚至表现出某种叛逆倾向时,国家才会在政治上贬低和惩治它,在经济上刻薄和亏待它;只要它基本听话,就算让它发发牢骚,国家也会给予它比较优厚的待遇。“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也可以说是官吏之末(候补官吏),只有在个别不正常的情况下,才会沦落为“臭老九”。因此,在本阶层范围内的利益分配,知识分子也是当仁不让的。他们也会使手腕、使脚绊,相互揭短、构陷和攻

击,也会提着大包和小包到国家的代表那里去通关节,甚至会低首乞怜,哭天抹泪……也有人不争不抢,捡别人挑剩的或什么也捡不到,也有人主动推让,让别人先上,不过,这些人,即使是在清高的知识分子看来,也是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活宝、傻瓜蛋。自我保护的本能、保护配偶和幼仔的本能,迫使他们放下骄矜的架子,充当一回俗人。不过,这并不影响他们对自己清高的总体评价:他们每个人都认为这只是得到自己的“本分”,没有超出这一界线去谋求权势。这种自我保护无疑能减弱知识分子严重的自卑和无能感,而他们那高贵的、高洁的操守也只有不断得到这种“鄙俗”的滋养,才能保持下去,否则真会斯文扫地,以至斯文不如扫地了。

坚强——脆弱、自傲——自卑、崇高——鄙俗只是清高性格和心理的几个基本特征,此外,还可以用伟大——渺小、勇敢——怯懦、精神胜利——逃避现实、思想激进——行动无能等一系列相互矛盾的词语来对它加以描述。无论哪一种清高者,都兼具这两方面的特质,只不过在一些清高者那里,前一方面的特质占主导地位,他们是清高者中最富有叛逆性、最有才华、最能创造文化成就的人。另外一些清高者,前一方面的特质没有这么强,而后一方面的特质却较为明显,他们大都是一些中庸的、保守的、缺乏创造性的、洁身自好的、明哲保身的知识分子,包括一部分入仕后保持相对的精神与人格独立的知识分子和大部分未入仕的普通知识分子。

告别清高

在以上论述中,我们用“清高”来指称传统社会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人格状态,这里的“传统社会”,乃指一种保守的、封闭的、以自然经济和等级专制制度为核心的社会结构。客观地、公正地说,在这样一种传统社会里,知识分子能达到“清高”这种人格状态,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他们已经为此付出了很大努力和代价;同时,正是“清高”这种人格和精神状态,使知识分子保持了相对独立性,正是在“清高”这种人格和精神状态中,孕育出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

然后,历史的列车已经开进了现代社会。所谓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恰好相反,指一种开放的、多元的、竞争的、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核心的社会结构。这样一种社会结构的发展(所谓现代化),向知识分子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要求:

1. 要求知识分子与社会的经济生活领域和政治生活领域、与物质财富和政

治权力之间,建立一种建设性的、良性的互动关系

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趋势,从客观上不仅要求知识分子,而且要求普通民众的介入和参与,这就给知识分子参政和经商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现代社会是一个平民分享物质财富和政治权力的社会,民众的参与程度越高,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就越能充分地发挥作用,民主政治的权力制衡机制就越有效。这与传统社会形成鲜明的对照:在那里,统治阶级垄断政治权力和物质财富,只能按照统治阶级单向的要求和标准从平民中选拔知识分子,从知识分子中补充统治集团的成员,平民和知识分子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愿望、要求、理想和标准去主动地、积极地分享政治权力和物质财富。现代社会以公民权利为本位,在此基础上,发展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从而使民众和知识分子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之间,建立一种建设性的关系:民众和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中分享物质财富和政治权力,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也在民众和知识分子的参与下,获得长远的、健康的发展。

2. 要求知识分子改变其基本价值取向,即改变对物质财富和政治权力的消极的、否定性的评价,重新确立德行与事功、仁义与权利、人格完善和精神高洁与政治权力和物质财富的关系

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条件下,这两者不是截然分开的,也不是相互对立的。离开事功、权利、政治权力和物质财富而独立存在的德行、仁义、人格完善和精神高洁是虚无缥缈的,对事功、权利、政治权力和物质财富的公平的、合理的、光明正大的追求,正就是德行和仁义的基本含义,也是人格完善和精神高洁的基础和前提。反过来说,追求政治权力和物质财富,追求世俗的成功和幸福,不一定就是不道德的、不仁不义的、邪恶的,人们完全可以合符道德地去“争权夺利”、“建功立业”;遵守竞争规则和道德准则,也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本来含义和内在要求之一。

与此同时,道德判断只是价值判断的一个方面,不能作为对人与事物的最高判断而凌驾于其他价值判断,如利害判断、是非判断、功过判断、美丑判断等之上,更不能作为唯一的标准而取代其他一切标准(后文我将专门论述这一问题)。

3. 要求知识分子改变那种武断、偏执、僵硬、保守、消极、空幻、玄妙的思维方式,建立一种开放的、宽容的、灵活的、创造性的、求新求变的、务实的思维方式

要知道,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本质上就是开放的、宽容的、灵活的、创造性的、求新求变的和务实的,就像传统社会结构本质上是封闭的、僵硬的、保守的、

一元化的、单极的一样。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就要求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必须从根本上放弃传统的思维方式,以适应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

4. 要求知识分子改变那种内部分裂的、畸形的、病态的性格和心理,而建立一种自尊、自主、自立、自强、开朗、自然、真诚、积极进取、身心和谐、言行一致、健康向上的性格和心理

传统的清高型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忍受文化与政治经济、出世与入世、精神追求与世俗责任等之间的断裂,造成身心之间、灵肉之间、本能与意识之间、欲望与道德之间极其紧张的冲突。他们的心情往往时而极度亢奋,时而极度沮丧,时而极度桀骜,时而极度自卑;他们不得不用精神胜利法来达到自己的心态平衡,不得不用假面具和虚伪来达到与环境的生态平衡。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在文化与政治经济、出世与入世、精神追求与世俗责任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使知识分子有可能把自己的理想与现实结合起来,有可能在世俗的现实生活内部和其基础上,培育和创造一种精神生活,这就能够从根本上消除知识分子内心的分裂状态。当然,这同时意味着知识分子要放下自己清高的架子,投身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之中去。

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清高”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

这使我们回想起欧洲中世纪骑士精神的衰落。骑士精神曾经代表着勇敢、冒险精神、浪漫主义以及对爱情的热烈追求。随着火器和火炮的使用,等级制的崩溃,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的兴起,骑士精神便逐渐变得不合时宜,并最终在唐吉诃德手执长矛与风车搏斗的滑稽形象中完全终结。

这也使我们回想起中国武侠精神的衰落。中国古代的武侠英雄,在社会体制之外,匹马横刀、单剑独骑地惩恶扬善、伸张正义,成为古代中国人民的两大救主和崇拜对象之一(另一个就是在体制内替天行道、大公无私、断案如神的包公式的清官、“青天大老爷”)。很显然,现代社会倡导科学、民主和法治,反对个人复仇和私自使用暴力,武侠英雄便逐渐失去其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知识分子如果不改变其清高的人格、价格取向、思维方式、性格和心理状态,将对现代化的进程和知识分子本身的发展起双重的阻碍作用:知识分子固守清高,不肯放下架子和面子,对权力和财富持鄙视(骨子里是惧怕)态度,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就会因为吸收不了大批知识分子而始终停留在低层次和低水平上;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因此也失去了改变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分享社会的物质财富和政治权力的机会。

因此,无论是对社会的发展而言,还是对自己的前途而言,知识分子彻底放弃清高的时候已经到了。

无非是放下“架子”和放弃“面子”而已。

想当年,我作为一个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大学讲师,骑着三轮车、板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飞奔,与各家出版社和供货商讨价还价,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书市上大声吆喝叫卖,奇怪的是,我不仅没有丝毫的屈辱和羞怯,反而有一种冲决自我束缚,战胜自我的快感,一种回归到艰苦的童年、少年时代的农村生活,回归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根基、基础、根本、本体——劳动的光荣和自豪。记得有一次,我蹬着三轮车路过一个机关大院,在门口碰到我的一个学生(毕业后做了这个机关的干部),他奇怪地看了看我,用无限同情和惋惜的语气对我说:“王老师,你想挣钱,也可以想想别的办法呀,何必干这种粗活?照你这么干下去,何年何月才能脱贫致富?”我抹了一把满头的汗水,平静地说:“我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只能以平民的方式进入市场。关键是先迈出第一步。”

不错,关键是能够迈出第一步。

迈出这一步,我们失去的只是“架子”和“面子”,而获得的将是一个广阔而丰富的世界!

清高与忧患

上文似乎只是关心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自我革命、自我解放。那么,知识分子难道只需关心自己的权力和利益,而不须承担社会责任吗?中国知识分子历来“以天下为己任”,主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主张自己对国家、民族、社会以至历史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从孔子到谭嗣同,无数知识分子挺身干预国家政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甚至不惜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难道他们都错了吗?现代的知识分子难道应当放弃其与生俱来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放弃其作为“社会良心”、“社会良知”、“无冕之王”的荣誉和义务吗?

实际上,谈到清高时,已经从一个侧面谈到忧患了。古代中国知识分子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老庄为代表的清高型(出世型)知识分子,另一类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忧患型(入世型)知识分子。这两类知识分子又是性格和智慧互补的:忧患型知识分子(儒家)往往吸收道家的智慧作为退身自处之策,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清高型知识分子(道家)也往往吸收儒家的人世热情,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挺身拯救一个破碎的世界(历代开国皇帝的高级智囊大都是道家出身的)。

在中国历史上,清高与忧患这样几种互补形态: